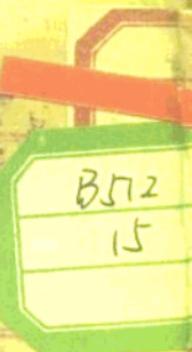


何方的學哲勝聯蘇論

「史學哲歐西」於關在夫諾丹日
言發的上會論討作著



版出店書華新東膠

論蘇聯哲學的方向

——日丹諾夫在關於亞歷山大羅夫的

「西歐哲學史」著作討論會上的發言——

學政軍東華圖書館

第二

導言

同志們！關於亞歷山大羅夫同志的著作的討論，已經超出了討論題目的範圍。它廣泛而深入地展開了，同時也提出了在哲學陣線上所發生的更一般性的問題。討論會變爲一種研究在科學的哲學工作中所遇見的各種問題的全蘇聯會議了。這當然是完全自然的和合乎規律的事。編著哲學史教科書，在這領域中第一本馬克斯主義的教科書，是一種有着巨大的科學意義和政治意義的任務。因此，組織這次討論會的中央委員會對這問題所付出的注意不是偶然的。

著作一部好的哲學史教科書——這就是意味着用新的有力的思想方法的武器來武裝我們的知識份子，我們的幹部，我們的青年，同時也是意味着在馬列哲學發展的道路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因此，在這兒對教科書所提出的高度的要求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所以討論範圍的擴大只能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的。它的收穫毫無疑問的將會很大，何況這兒不僅涉及了評價教科書的問題，而且涉及了更廣泛的哲學工作上的諸問題。

現在讓我論及兩個主題。我並不想來把這次討論作一總結，這是『西歐哲學史』作者的任務，我現在是順着討論的程序來發言的。

預先請求原諒的是我將要使用引證，雖然巴斯金同志再三提醒我們每個人不要這樣做。當然囉，對於他這個哲學的老海狼不用航海的儀器，憑着視力，憑着想像——像水手們常說的，便能輕而易舉地在哲學的海洋中航行了。（笑聲）但請允許我這個初次當驚濤駭浪的時候出現在哲學大船的頭盞搖籃的甲板上的哲學兒習水手應用引證，作為不致離開正確航線的一種指南吧。（笑聲，鼓掌）

我現在開始批評「西歐哲學史」教科書。

（一）亞歷山大羅夫同志的著作的缺點

我想我們有理由要求哲學史教科書遵守以下的條件，這些條件在我看來是起碼的

哲學史教科書應遵守的條件。

第一、在教科書中應當確切地規定作為科學的哲學史的研究對象。

第二、教科書應當是科學的，就是說，是以辯證的和歷史的唯物論現代的成就的基礎作根據的。

第三、必需要使哲學史的敘述不是煩瑣學派的而是富有創造性地能够發生積極作用的，要直接跟現代的任務相聯繫着，使這些任務明確化，並指出哲學的今後發展的遠景。

第四、所引用的事實材料要完全被檢驗過而且是品質優良的。

第五、敘述的文體應當是清晰的，確切的，富於說服性的。

我認為該教科書（即指「西歐哲學史」教科書，以下凡提教科書皆指此書——譯者註）並沒有滿足以上所提的要求。

首先談一談科學的研究對象。

基文柯同志指出亞歷山大羅夫同志的教科書關於科學的研究對象沒有給予一個清晰的概念，雖然在教科書中引出了大量有著部分意義的定義，但其中沒有一個網羅無

正確的。這樣一來，作為科學的哲學史的研究對象便沒有予以規定。在第十四頁上所下的定義是不完全的。在第二十二頁上用斜體字所標出的定義，顯然是當作基本的定義的，但實在說來，是不正確的，因為如果同意作者的「哲學史是人類對他周圍世界的知識之漸進的，上升的發展歷史」這一定義的話，那末這就是說，哲學史的研究對象跟一般的歷史科學研究對象沒有兩樣了，在這場合下，哲學本身便彷彿成為科學的科學，而這是早已被馬克斯主義所推翻了的。

作者肯定哲學史同時是許多現代思想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也是不對和不確切的，因為「現代的」這一概念在這場合下是跟「科學的」這一概念相混同，當然是錯誤的。在規定哲學史的研究對象時必需由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對哲學的科學所下的定義出發。

「馬克斯把黑格爾這一革命性的一面吸收了而且加以發展了。辯證唯物論「不需要任何站在其他科學上面的哲學。」從所有以前的哲學中祇剩下「研究思維及其法則的學說，也就是形式邏輯和辯證法。」而辯證法——照馬克斯的理解，同時根據黑格爾的學說——包括了現在稱為認識論的，認識限度論的理論，這種理論在研究和概括認識的起源和發展，由無認識向認識的過渡的時候，應當把自己研究對象一視同仁地站在歷史的觀點上來處理。」（列寧全集第八卷第十一頁）

由此看來，科學的哲學史是科學的唯物世界觀及其法則的胚胎，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又由於唯物論是在跟觀念論的派別的鬥爭中成長和發展起來的，所以哲學史同時也是唯物論跟觀念論鬥爭的歷史。

亞歷山大羅夫不理解哲學發展的具體的歷史過程，

因而便不理解馬克斯主義。

在哲學史中所具有的意義。

錯誤。

至於談到教科書的科學性，即是出該書之利用辯證的和歷史的唯

物論之最現代的成就的觀點上來看，那末教科書也犯了許多很嚴重的

作者把哲學史和哲學的思想和體系之發展過程描寫成平穩的，進化的，藉助量變的增長而發展的過程。給人一種這樣的印象，好像馬

克斯主義的發生不過是以前進步的學說——首先是法國的唯物論，英國的經濟學和黑格爾的觀念學派等學說的發展的簡單繼承人罷了。

作者在四七五頁上寫道，在馬克斯，恩格斯之前所創造的哲學理論雖然間或包含着偉大的發見，然而在其各種結論中仍然不是貫澈到底的和科學的。這定義僅僅是把馬克斯主義當作在其各種結論中

貫澈到底的和科學的學說來跟馬克斯主義以前的哲學體系相區別。因此，馬克斯主義跟馬克斯主義之前的哲學學說的區別僅僅在於這些哲學不是貫澈到底的和科學的，僅僅在於舊的哲學是『錯誤的』。

這樣看來，這兒的問題不外是量的變化罷了。然而這是形而上學。馬克斯主義的發生是一件真正的發現，是哲學中的革命。當然，正如任何一種發現，正如任何一種飛躍，逐漸性的中斷，任何一種到新的狀態的過渡，它——這種發現——沒有先行的量的變化的積累是不可能發生的，在以上所說的場合下，沒有在馬克斯——恩格斯的發現之前的哲學發展的總結是不可能發生的。作者並沒有清楚的理解，馬克斯和恩格斯創造了新的哲學，在質上跟所有以前的哪怕是進步的哲學的體系有著區別的新哲學。關於馬克斯對所有以前哲學的關係，以及關於馬克斯主義在哲學中所發生的轉變，把哲學變成科學，是人所共知的。尤其奇怪的是作者不把注意力集中到把馬克斯主義跟馬克斯以前的哲學發展聯合起來的問題上。

實際上馬克斯和恩格斯本人會說過，他們的發見是意味着舊哲學的完結。

「黑格爾的體系是哲學最後的，最完整的形式，因為它是作為一種獨立的凌駕其他一切科學以上的科學而思維着。由於它的破產，一切哲學都遭受到破產。只剩下思維和理解一切自然，歷史和精神世界——作為永無止境運動着的，變化着的，在經常的過程中是在發生和消滅的世界——的辯證法。現在不僅在哲學面前，而且在所有科學面前都提出了一個要求：即在各個領域中發現這一永恆的變革的過程的運動法則。黑格爾哲學留給其繼承人的遺產便在於此。」（恩格斯：反杜林論）

作者顯然不理解哲學發展的具體的歷史過程。

該教科書有一個如果說不是最主要，也可以說是本質的缺點，是忽視了那件事實，即在歷史的過程中，不唯對某些哲學問題的觀點是改變着的，而且問題範圍的本身，哲學的研究對象的本身也是處在經常的變化中，這種變化是完全合乎人類的認識的辯證性質的，而且是每個真正的辯證家所應當明瞭的。

在該書二十四頁上，亞歷山大羅夫同志在敘述古代希臘哲學時寫道：「在古代希臘奴隸制社會中，哲學是作為獨立的知識領域而發生。」下面進而寫道：「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知識領域在紀元前六世紀發生後，便得到廣泛的傳播。」

我們能够說古代希臘的哲學是一種獨立的，自成一類的知識領域嗎？毫無疑問的，這樣說法是不對的。古代希臘人的哲學觀點是跟他們的自然科學的，政治的觀點交織得如此密切，甚至我們不應而且也沒有權利把我們晚近所發生的科學的劃分及其分門別類搬進希臘的科學上。問題的實質是希臘人僅知道一種整體的，連哲學的概念也包含在內的科學。我們就拿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亞里士多德說吧，——他們每個人都一律證實了恩格斯的思想，即「最古代的希臘哲學家同時是自然知識研究家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哲學發展的獨特性乃在於：隨着自然和社會的科學知識的發展，由哲學中逐個地分裂出客觀的科學。因此，由於客觀科學的發展，哲學的領域不斷的縮小（順便指出，這個過程直到現在仍未終止），自然知識和社會科學從哲學的一手包辦之下解放出來，不論對於自然和社會的科學或者哲學本身都是一個進步的過程。

強求在無窮的過程中認識絕對的真理的過去哲學體系的創造人並不能幫助自然科學的發展，因為他們把自然科學束縛在圖式里，專心致志於站在科學之上，把不是由實際生活，而是由體系的要求而得出來的結論來綁緊活的人類認識。在這些條件下，哲學便變成一所堆積着形形色色應有盡有的事實，結論，假說，甚至幻想的博物館了。如果說哲學會是可以用來洞察，用來體察，那末它並未會適合做一個實際影響世界的工具，做一個認識世界的工具。

這類體系的最後一個是黑格爾的體系，他想建造一座哲學的高樓大廈，置一切其他的科學於自己的腳底下，把其他科學硬嵌進他那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範疇里；當他期望解決一切矛盾時，他便跟那被他自己所猜對的，然而並不瞭然的，因而也就應用得不正確的辯證的方法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中了。

然而，「一旦我們明白了……要求哲學解決一切矛盾就是要求一個哲學家做完體全人類在其逐漸發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一旦我們明白了這個，那末在舊的意義上的哲學便終正變了，——」恩格斯指示道——我們應把用此方法和對於個別的人所不能達到的「絕對的真理」置諸高閣，而專心致志地循着客觀的科學和藉助辯證法將其結果總結起來的道路去追求為我們所能達到的相對的真理。

」（恩格斯·費爾巴哈論）

馬克斯和恩格斯的發現是表示舊哲學的完結，就是說，強求對世界無所不解釋的哲學的完結。

作者的含糊不明的公式抹煞了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天才的哲學發現的偉大革命意義，因為這些公式把重點放在把馬克斯跟先行的哲學家相聯在一起上面，而不去表明從馬克斯起，開始了完全嶄新的，第一次成爲科學的哲學史的時期。

完全由於這個錯誤，該教科書宣教着非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史的解釋，把哲學史解釋爲諸哲學派別的逐漸更替。由於作爲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的馬克斯主義的出現，哲學史的舊時期結束了，那時哲學史是一些獨夫們的事情，曾是由數量不大的哲學家及其門徒組成的，關門造車的，跟生活，跟人民脫離的，跟人民無緣的哲學派別的財產。

馬克斯不是這樣的哲學派別。相反，它是舊哲學的克服，那時哲學會是少數特殊人物——精神的貴族——的財產，是哲學史全然嶄新的時期的發端，從這時候起，哲學成爲握在無產階級大衆手中的，爲其從資本主義中解放而鬥爭的科學武器。

馬克斯主義哲學跟以前的哲學體系不同，它不是在其他一切科學之上的科學，而是科學的探究的工具，是深入所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而且是在這些科學發展的過程中被這些科學的資料所豐富着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的馬克斯主義哲學是對一切先行的哲學的最澈底而堅決的否定。但否定，如恩格斯所強調指出的，並不就是說『沒有』。否定包含着繼承，意味着吸收，批判的改造和對一切在人類思想史上已經達到的前進的和進步的東西予以新的高級的綜合後再加以聯合。

由此便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因爲有馬克斯主義的辯證法的存在，哲學史應當包含這個方法的準備歷史，顯示這個方法發生的條件。在亞歷山大羅夫的著作中，邏輯和辯證法的歷史沒有交代出來，作爲人類實踐反映的邏輯範疇的發展過程沒有表明出來；因而該書緒論中所引的列寧的指示，即每一個辯證邏輯的範疇，都應認爲是人類思想史的重要關鍵，沒有被遵照去做。

教科書沒有敘述近百年來的哲學史
人工地分成西歐哲學史和俄國哲學史

完全無法辯護的是那件事實，即該教科書的哲學史祇敘述到馬克斯哲學的發生；或者到一八四八年。沒有敘述最近一百年來的哲學史的教科書，當然不能稱為教科書。作者為甚麼毫不憐惜地捨棄了這一時期，是難以令人理解的，而且不論在序言或者緒論裏都找不到任何的說明。

該教科書中不包括俄國哲學發展史也是沒有任何理由的。這種省略是帶有原則性的不待言的。從一般的哲學史裏摒除俄國哲學史，不管作者是出於甚麼動機，然而這種對俄國哲學史的隻字不提在客觀上便是降低俄國哲學史的作用，把哲學史人工地分成西歐哲學史和俄國哲學史，而且作者並未做任何的企圖說明這種分法的必要。這種分法是把布爾喬亞把文化分為「西方的」和「東方的」奉為天經地義，把馬克斯主義視為地方性的「西方的」思潮。更有進者，作者在緒論的第六頁上熱烈地證明一個相反的論點。力圖「不注意研究和利用俄國古典哲學家所給予的過去哲學體系的深刻批評，便不能得出關於西歐各國哲學思想發展過程的科學概念。」為甚麼作者在教科書中沒有實現這個正確的論點呢？這樣情形完全令人不解，又由於哲學史的敘述任意在一八四八年截止，給人留下了一種沉悶的印象。

發言的同志們正確地指出了在闡明東方的哲學史中也是一塊空白。

顯然，單憑這一個理由，該教科書就需要根本的改造。

有幾個同志指出，顯然應作為作者「信條」的該教科書的緒論正是作者拒絕了作為馬克思主義特性的黨性原則因而作者向舊布爾喬亞的學派

確地規定了研究對象的任務和方法，然而，似乎作者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我認為這個批評是有缺點的，因為緒論本身也是不對的而且經不住批評的。關於哲學史研究對象的定義之不正確和不確切，我已經

說過了。但這還不够。在緒論裏還有其他理論上的錯誤。同志們已經在這兒說過，最大的牽強附會是在敘述馬列主義的哲學史的基礎時引證車爾內舍夫斯基、杜勃留波夫和洛曼諾索夫；當然，這些人與問題是沒有直接關係的。然而問題尚不止於此。由這些偉大的俄國學者和哲學家的著作中所摘錄的引證顯然選擇得不適當，在引證中所包含的理論的命題，站在馬克斯觀點上看，是不正確的，而且我要更進一步地說，甚至是有害的。在這問題上我並沒有絲毫的意思向這些被引證的作者們本人的鼻子上抹灰，因為這些證據是任意選擇的，而且是屬於那些情形，這種情形跟作者所希望證明的是沒有任何共同點的。問題是這樣的：作者援引車爾內舍夫斯基來證明各種不同的，那怕相對立的哲學體系的創始人彼此應當容忍相待。

請讓我引一段柴爾內舍夫斯基的引證文字：「學術著作的繼承者與其先驅者相對立着，而這些先驅者的著作正是作為他們本身著作的出發點。譬如：亞里士多德敵視柏拉圖，蘇格拉底拚命貶低詭辯家，而他却是這些詭辯家的繼承人。在新時代裏也能找到許多這樣的例子。但是有時也有可喜的情形，一種新體系的創始人確切地明瞭他們意見跟他們的先驅者所有的思想的聯繫，而且謙遜地稱自己為他們的學生；當他們發現自己的先驅者理解的缺點時，他同時也一清二楚地表白出來，這些理解對他們本身思想的發展是怎樣大有裨益。譬如，斯賓諾沙對笛卡爾的態度便是這樣的。現代科學創始人的優秀品質可以說是他們帶着尊敬和幾乎兒輩的摯愛對待自己的先驅者，完全承認他們天才的偉大和他們學說的高尚的性質，在這學說中胚胎着後進者觀點。」（亞歷山大羅夫同志的著作第六頁——七頁）

因為作者不加附帶條件的引證這段文字，顯然它是作者自己的觀點。如果這樣的話，作者果真走上在哲學中拒絕了作為馬列主義特性的黨性原則的道路了。馬列主義在跟所有唯物主義的敵人進行過並且正在進行着最尖銳鬥爭中永遠帶着那種熱情和不安協性是盡人皆知的。在這場鬥爭中，馬列

主義者總是使其敵人遭受到毀滅性的批判。作為跟唯物主義的敵人作斗争的武器的是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論』一書，其中列寧的每一句話都是消滅敵人的一把利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才，——列寧說，——正是在於：在很長的時期內幾乎半世紀時間，他們發展着唯物主義，把哲學中的一個基本的方向向前推動，不是在已經決定的認識限度論的問題上反復重述上面趙趙不前，而是貫徹到底地運用，——表現出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不斷運用那同一的唯物主義，把那些胡說八道、大言不慚的狂言妄語，在哲學中「發現」『新』路線，證明『新』學派等無數的企圖，像掃除灰塵污垢似的掃除乾淨。

列寧進而寫道：「最後，您試把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他著作中的個別的哲學評論拿來，——您就可以看見一個不變的基本：堅持唯物主義和輕蔑的嘲笑對觀念主義的任何遮掩，任何蒙混，任何退却。馬克思所有的哲學評論都不離這兩個根本的對立物的周圍——從學院派哲學的觀點來看，馬克思的哲學評論的缺點即在於這個『狹隘性』和『片面性』」（列寧全集第八卷）

盡人皆知，列寧本人就不憐惜自己的敵人。抹煞和妥協哲學流派之間的矛盾，列寧僅把它看作反動的學院派哲學的一種策謀。既然在這之後，亞歷山大羅夫同志在其教科書中對待哲學上的敵人怎麼能够作為一個不忍殺生的素食主義的說教者而出現呢？這種素食主義無疑是向哲學上的僞客觀主義進貢，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在跟所有觀念主義流派的代表者們進行無情的鬥爭中怎能發生，成長和勝利呢？（鼓掌）

亞歷山大羅夫同志不僅限於此。他把自己的客觀概念貫澈到教科書全部的內容。因此，那個事實不是偶然的，即當亞歷山大羅夫同志在未批評某個布爾喬亞哲學家之前，照例向他的功績「進貢」，向他焚香叩首。書中所提到傅利葉關於人類發展的四個階級的學說就是個例子。

傳利葉的社會哲學的最大成就，亞歷山大羅夫同志說：「是關於人類發展的學說。照傳利葉的意見，社會在其發展中要經過四個階段：（一）上升的破壞，（二）上升的和諧，（三）下降的和諧，（四）下降的破壞。在最後一個階段，人類將要經歷一個衰老時期，在這時期後，地球上任何生命都要停止。由於社會的發展是離開人們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因此發展的高級階段是跟四季更替一樣不可避免地到來。傳利葉從這個論點得出結論說，布爾喬亞的制度將不可避免的代以在其中統治着自由的和集體勞動的社會。不錯，傳利葉的社會發展理論是被四個階級的範圍所限制住，但在那個時代來說，這理論是前進了一大步。」（亞歷山大羅夫：西歐哲學史）

這兒沒有絲毫馬克斯主義分析的痕迹。傳利葉的理論比較甚麼前進了一步呢？如果它是由局限在某一個階級的範圍內的，那就沒有什麼可取之處了。但傳利葉的理論是由於它把人類的發展分成四階段，而且第四階段是下降的破壞，由於破壞的結果地球上任何生命都停止了，那末怎樣理解作者不滿意傳利葉的社會發展理論僅限於四個階段的範圍，那就僅剩下陰暗的生活，怎樣會有人類的第五階段呢？

亞歷山大羅夫同志幾乎在所有的舊哲學家身上都能找到說幾句好話的地方。這是大的布爾喬亞的哲學家，在他面前愈是多燒香。這一切的結果，勢必使亞歷山大羅夫同志——也許他連自己都不知道——成爲布爾喬亞哲學史家的俘虜，這些哲學史家的觀點是在每個哲學家身上首先占據着的。他們的司空見慣的基本原則——它的指導性，它的黨性。因爲列寧教導我們，「唯物論包含着我們稱之爲黨性這東西，當評價任何事件時，務須直接而公開地站在一定的社會集團的觀點上」。（列寧全集第一卷二七六頁）在該教科書中哲學觀點的敘述是以抽象的，客觀主義的，中立的方法處理着的。在該書中哲學的

派別是一個跟着一個或者一個在另一個之旁，而不是在互相鬥爭中配伍着的。這也是同學院派，向驗授派「進貢」。由此看來，在哲學中的黨性原則的敘述上，作者完全沒有做成功不是偶然的。作者引證黑格爾的哲學作為在哲學中的黨性的例子，而敵對哲學的鬥爭則用黑格爾本身內部的反動和進步的因素的鬥爭來示例。這種證明的方法不僅是客觀主義的折衷主義，而且是明顯地粉飾黑格爾，因為用這種方法想證明在他的哲學中有多少進步的東西便有多少反動的東西。爲了快點結束這個問題，我再補充說兩句，亞歷山大羅夫同志所介紹的評價各種哲學體系的方法——「功績與缺點並存」（見亞歷山大羅夫同志的著作第七頁）或者「這種理論也有重要的意義」——是有着極端不確定性的毛病的，是形而上學的和只能混淆問題的。亞歷山大羅夫同志爲甚麼一定要向舊布爾喬亞學派的學院科學傳統臣服進貢，而忘却在跟敵人鬥爭中要求不受協性的唯物論的基本命題，實令人不解。

哲學體系的批評對象之選擇應合乎目的性的
哲學體系的批評對象之選擇應合乎目的性的
的敵人利用的哲學體系和思想應以特別的尖銳性予以批評。屬於這一類的特別是新康德派，神學，舊的和新的不可知論的翻版，以及企圖把上帝私運到現代的自然科學裏面和那目的在於把觀念論的陳年舊貨縫縫補補和從新改裝以應市場需要的一切擴張物里面。現在被帝國主義的哲學奴僕們所採用以支持嚇得魂不附體的主人那個武器庫就是這樣。
● 緒論還含有關於反動思想和進步思想以及哲學體系之理解底不正確解釋。雖然作者加以附帶條件說明關於某種思想或者哲學體系的反動性或者進步性的問題應當以其體的歷史來決定，但他却一再地忽視馬克思主義關於同一個思想在不同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可能是反動的和進步的命題。作者採然了這個問題，用走樣的方法給超歷史觀點的觀念論的概念之鑄入大開方便之門。

作者在說明各種不同的哲學體系時離開了該哲學所由發生的具體歷史環境和社會階級根源

作者進一步雖然正確地指出哲學思想的發展歸根結底是被社會生活的物質條件所決定，哲學思想的發展僅有相對的獨立性，但他自己却不斷違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這一基本命題，在說明各種不同的哲學體系時，一再把這個說明離開某種哲學所由發生的具體歷史環境和社會階級根源。譬如在說明蘇格拉底、得謨克里特、斯賓諾莎、萊布尼茲、費爾巴哈等人的哲學觀點時便是這樣處理的，當然這是不科學的，使人有理由相信作者誤入了哲學思想發展的獨立性和超歷史性，而這就是觀念論哲學的顯著標識。各種哲學體系跟具體的歷史環境缺少有機的聯繫甚至在作者企圖給這個環境以分析的地方也是這樣。結果得出純粹機械的，字面上的，而不是實質的有機的聯繩。敘述相當時代的哲學見解的篇和章，以及專論歷史環境的篇和章，似乎是在某些平行的平面上旋轉，而在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歷史上的論據，因果聯繩的敘述本身照例是不科學的，沒有條理的，沒有在材料上面作分析的工夫，毋甯說是一種拙劣的參考資料。譬如，以「十八世紀的法國」為標題的第六章就是這樣的；它是一篇難以令人理解的記錄，絲毫沒有闡明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葉法國哲學思想的淵源。因而法國哲學家的思想失掉了跟時代的聯繩，開始作爲一種獨立的現象而出現。請讓我唸一唸教科書中這個地方吧。

「從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開始，法國隨英國之後逐漸走上布爾喬亞發展的道路，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各方面經歷了百年來的根本變化。國家雖然仍是落後的，但已經從封建的停滯性中解放了出來。像當時許多其他歐洲國家一樣，法國進入了最初階段的資本主義積累時期。」

在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中，迅速地形成了新的，布爾喬亞的社會制度，發生了新的意識形態，新的文化。在這個時期，在法國像巴黎和里昂，馬賽和加富爾這樣城市的迅速生成開始了，有力的海軍

建造起來了。逐一地成立了國際性的貿易公司，組織了征服整系列的殖民地的武裝遠征隊。商業迅速地成長。在一七八四年至一七八八年對外貿易額達十億一千一百六十萬里弗爾，較之一七一六年至一七二〇年的貿易超出四倍多。亞痕條約（一七四八年）和巴黎條約（一七七四年）助長了商業的興旺。特別可以作為指標的是出版事業。譬如，一七七四年法國的出版貿易額達四千五百萬法郎，當時在英國才達一千二百萬至一千三百萬法郎。將近半數的歐洲所有黃金貯藏是在法國手中。但是法國仍不失為一個農業國家。大多數的法國居民是從事農業」（三一五頁至三一六頁）

這當然不是分析，而是一些一個挨着一個的，彼此沒有聯系的事實的簡單一覽表。自然而然，從這些關於「下層基礎」的資料得不到，而且也不能得到其發展似乎脫離當時法國歷史環境的法國哲學的任何描述。

我們再拿亞歷山大羅夫同志著作中關於德國觀念論哲學發生之描述作為例子來看。他寫道：「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上半期，德國是一個具有反動政治制度的落後國家。其中統治着封建的農奴制和手工業行會制。十八世紀末，城市的居民不到百分之二十五，從事手工業的僅佔居民的百分之四。賦役，徵租，農奴法，行會的特權，這一切都妨礙已經產生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何況在國內支配着極端的政治割據性。」

亞歷山大羅夫同志書中所引的德國城市居民的百分比，按照他的意見，應是表示該國的落後性及其國家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反動性。但與此同時，法國城市居民少於百分之十，然而法國却不像德國是落後的封建的國家，而是歐洲布爾喬亞革命運動的中心。由此可見，城市居民的百分比本身是甚麼都沒有說明，而且它本身也應由具體的歷史環境來說明。這也是在說明某種意識形態的形式的發生和發展中對於歷史材料利用得失當的例子。

亞歷山大羅夫進而寫道：「當時最著名的法國布爾喬亞的觀念論者康德，而後費希特和黑格爾在他們所創造的觀念論的哲學體系中用那為德國的現實的局限性所制約着的抽象形式來表現當代德國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

我們試把這個冰冷的，漠不關心的，客觀的事實的敘述——從這些事實里是不能明瞭德國的觀念論發生的原因的——來跟那用激動和信服讀者的，生動的，戰鬥的風格所敘述的當時德國環境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作一比較。我們看恩格斯怎樣描述德國的環境：「這是一大團發霉的，腐敗的東西。誰也不滿意自己的處境：手工業，商業，工業和農業弄到最微不足道的規模。農民，商人和手工業者受到變層的壓迫；吸血的政府和商業的蕭條。貴族和公爵們覺得他們的收入——雖然他不斷地從被統治者身上壓榨——不應落在他們日益增長的消費之後。一切都是污穢的，全國籠罩着普遍的不滿。沒有教育，沒有影響大眾智力的工具，沒有出版自由，沒有社會輿論，沒有跟其他國家較大的貿易；到處祇有醜惡，自私自利——整個民族滲透着下賤的，奴性盲從的，小商人的氣味。一切都在腐朽，在動搖，眼看要垮台，甚至不能希望良好的改變，因為在人民中還沒有那種能够掃除瀕死機關的正在窗臭的屍體的力量。」（馬克思與恩格斯第五卷六頁至七頁）

這樣看來，作者未能勝任用唯物論的方法來敘述哲學史這一任務，而這便使這一本書失去了科學的性質，在極大的程度上把它變為從歷史環境以外取來的哲學家的傳記及其哲學體系的敘述。歷史唯物論的原則被違犯了，這原則教導我說：「應當在各式各樣的社會機構的存在條件的細節中加以研究。

試把恩格斯這一鮮明的，鋒利的，確切的，深刻科學的描述跟亞歷山大羅夫所給予的描述作一比較，您便可以看見亞歷山大羅夫同志怎樣拙劣地利用着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遺給我們取之不盡的財富。

，如果想從它們之中結論出與其相當的政治的、私有權的、美學的、哲學的、宗教的以及諸如此類的觀點的話。」（摘自恩格斯於一八九〇年八月五日給史密特的信）

作者對哲學史的研究目的沒有明確規定 作者對哲學史的研究目的之界說也是不明確和不夠的。作者沒有在任何地方強調實踐中驗證哲學上的諸命題，用新的命題代替舊的命題。作者主要的是由哲學史的發學的意義出發，是由純文化啓蒙的任務出發，因而給予哲學史研究的全部事業以消極直覺的，學院的性質。這當然跟馬列主義的哲學科學底定義不相符合；這種科學跟其他各種科學一樣，應當拋去舊的命題，以新的命題來不斷發展自己，完成自己和豐富自己。

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到問題的教學啓蒙方面，因而就給科學的發展劃定了界限；彷彿馬列主義已經達到頂點，這種學說的發展任務已經不是主要任務了。這種見解是跟馬列主義的精神相矛盾的，因為它站在形而上學的觀點上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完成的和盡美盡善的學說，這樣只能削弱活生生的和求知慾盛旺的哲學思想。

作者離開自然科學的發展問題來敘述哲學史，因而直接損害其科學性的條件。 對於自然科學的發展問題的闡明也完全沒有做得好，同時，哲學史是不能離開自然科學來敘述而直接損害其科學性的。因此，亞歷山大羅夫同志的教科書未能說明在現代自然科學成就的花崗石基礎上生成起來的科學唯物論的發生和發展的條件。

亞歷山大羅夫在敘述歷史時，竟獨出心裁地把它跟自然科學史脫離開來。最為特徵地是在敘述該書基本目標的緒論中的作者關於哲學和自然科學的主權關係一字不提。他甚至在看起來似乎完全不可能的地方都對自然科學默不作聲。譬如作者在第九頁上寫道：「列寧在其著作中，尤其在『唯物論與